

大学研究型课程专业系列教材

中国语言文学类

# 现代汉语研究导引

杨锡彭 编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研究导引 / 杨锡彭编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3

(大学研究型课程专业系列教材·中国语言文学类)

ISBN 7-305-04576-4

I. 现... II. 杨... III. 汉语—研究—现代—高等学校—教材 IV. H10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0414 号

丛 书 名 大学研究型课程专业系列教材·中国语言文学类

书 名 现代汉语研究导引

编 著 杨锡彭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电 话 025-83596923 025-83592317 传真 025-83328362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邮件 [nupress1@public1.ptt.js.cn](mailto:nupress1@public1.ptt.js.cn)

[sales@press.nju.edu.cn](mailto: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印 刷 阜宁人民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23.75 字数 473 千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ISBN 7-305-04576-4/H·415

定 价 33.00 元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大学研究型课程专业系列教材

## 顾 问

[学校按拼音顺序排列]

北京大学	温儒敏
北京师范大学	张 健
复旦大学	陈思和
华东师范大学	陈大康
南开大学	陈 洪
清华大学	王中忱
山东大学	陈 炎
武汉大学	尚永亮
中山大学	欧阳光

# 序

周 宪

近些年来,大学文科的教材建设可谓突飞猛进。各类教材林林总总,百花齐放。实际上,作为教学改革的一个“抓手”,教材的变化反映了教学改革的深化。

诚然,教材数量增多并不足以表明教学理念的深刻转变。不少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感到,虽然教材的品种很多,但是真正合用的、有特色的教材却并不多见。常见的情况是多本教材虽然体例结构有所差异,但内容上并无根本不同,只是排列组合上有所不同。这表明,教材建设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变,而如何改则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教学理念。

说到这里,我想对大学文科教育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谈一点看法。过去我们通常认为,应试教育主要反映在基础教育(中小学)阶段,大学基本上没有这种情况。这些年来,客观地说,应试教育的某些征兆也出现在大学教育中。“背多分”的现象不再是少数,高分低能现象也随处可见。死啃一本教材,就可以得到高分。这其中一方面有学习考核方式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搞定一本教材便可过关,甚至得到高分评价。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如何使得教材更符合大学文科教与学的特点?如何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去钻研问题?如何

通过教材的把握让学生进入更广阔的知识领域?一言以蔽之,如何更好地培育出学生敏锐的问题意识?这是当前教材建设亟须解决的问题,也是所谓研究型教材的主旨所在。

此处推出的“大学研究型课程专业系列教材”,从浅层看,好像只是把过去教材编写者的“一言堂”,转变为读本性质的“群言堂”。但往深层看,这里有一系列教学理念及教材编写理念上的变化。

首先,这套教材旨在强调研究性。研究性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突出教材本身的问题型结构和理路。传统教材的通史通论型结构,因照顾到知识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往往对特定学科的核心或前沿问题关注不够。这样对学生训练偏重于全面掌握知识却忽略了问题意识(主要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意识及其能力)的培养。这套教材以问题为核心来架构,每章或每个单元以一个相对独立的重要问题为中心来设计。这样可以改变过去教材的单纯的历史线索或逻辑结构的束缚。因此,不再强调知识面面俱到,也不强调学习平均用力,而是聚焦于本学科的重要问题,强化学术研究上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结构使教材更具弹性和灵活性。对编者来说,可以根据学科知识的发展不断修订增删,进而改变过去教材编写的误区,即受制于结构很难修订,不得不推倒重来。对教师来说,以问题为中心的结构框架,也可以为他们富有个性的授课留有充分的空间和自由,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研究特长作相应的调整。第二,注重学生思维方式的训练和研究能力的培养。这套教材以典范性研究论文为主干,因此选文凸现了如何发现和确定问题、如何研究问题、如何采集相关资料、如何思考和分析问题、如何得出科学的结论等。每章都有一个导论,每篇范文都有具体的分析和概括,还附有延伸阅读以及思考题,这些设计都在强化问题意识这一主旨,这有助于改变传统教材只注重知识性而忽略研究性的倾向。

其次,这套教材意在突出研究范例性。依据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研究,科学知识的范式要素之一是所谓研究范例,通俗地讲,就是特定学科发展史上重要的、经典的研究个案。中国哲学史家冯友兰则指出,学术研究有“照着讲”和“接着讲”两种方式。前者是说别人怎么说的,后者是说从前人说到之处接着讲下去。把这两种看法结合起来,可以用来描述这套教材的典范性。就是通过研究范例的学习,首先学会“照着讲”,然后进一步发展出“接着讲”。因此,所谓范例性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选文的经典性。亦即力求把特定问题及其研究领域中具有代表性和经典性的学术论文选出来,这些论文不但具有权威性,而且代表了一定时期特定问题的研究水平。经过对这样的选文的解读,可以让学生了解具体的问题史和研究成果。选文不但关注问题史,同时也注重当前的发展和前沿性,将最新成果吸纳进教材中。第二,范例性还指选文作为具体的研究个案,对教师来说,是绝佳的授课内容;对学生来说,是上好的学习范本。老师通过讲解让学生掌握特定文本的研究范例,学生通过研读,模仿和学会如何研究问题、如何写作学术论文。由此实现研究型教材的特定

功能。

最后,这套教材彰显了学术观点的多元化。传统教材有时为了突出编写者个人的学术观点,往往采用一家之说,而对其他各种观点的介绍评析不足。由于本教材采用选文与导言相结合的方式,因此可以实现教材内容、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进而达到学术研究上的“视界融合”。多元化一方面体现在博采各家之说,尽显研究特定问题的思路或方法的多样性,形成了各家之说的对话性。另一方面,选文在学术论文的文体、方法和表述风格上也明显多样化,这有助于学生掌握多种阐释途径和写作方法,进而避免研究方法和写作上的“八股”文风。

由于这套教材采用了新思路和新构架,所以也面临一些新问题。

对教师来说,由于不同于传统教材,这套教材便对授课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教师不但要具有广泛的知识背景,而且对特定选文及其问题要有较深入的了解。如何编写教学提纲?如何选择其他相关资料?如何安排延伸阅读?如何考试和评价?如何强化教材的可操作性?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授课教师的创意摸索。

对学生来说,由于教材侧重于研究能力和问题意识的培养,因此,如何使用这套教材?如何在使用过程中紧扣研究能力和问题意味的训练?如何做到课堂听讲与课外阅读、课堂讨论和课程考试等诸多方面的有效结合,也有待学生的创造性的探索。

这套研究型教材凝聚了南京大学中文系诸多同仁的心血,尤其是中文系副主任徐兴无教授做了大量组织协调工作。借此机会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谢意!正是他们的敬业、合作和努力使新的教学理念得以实现。

总之,研究型教材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教材改革思路。作为编撰者,我们很希望听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以便将来再版修订,进而发展出更多的研究型教材。

#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导 论	1
专 题	2
五四白话文运动再认识(于根元)	2
汉语方言(许宝华 詹伯慧)	10
方言与普通话和书面语(游汝杰)	18
论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过渡语(李如龙)	21
规范化——对语言变化的评价和抉择(戴昭铭)	31
研究实践	42
第二章 语 音	44
导 论	44
专 题	45
普通话音位研究述评(李延瑞)	45
语流音变(林焘 王理嘉)	54
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吕叔湘)	69
汉语语句的节律问题(文炼)	88
研究实践	93
第三章 文 字	94
导 论	94
专 题	95
汉字的性质(裘锡圭)	95
现代汉字的性质和特点(费锦昌)	104
汉字简化(叶籁士 傅永和)	113
研究实践	122
第四章 词 汇	124
导 论	124
专 题	125
谈谈语素(徐枢)	125
词义和构成词的语素义的关系(符淮青)	134
汉语复合词内部形式的特点与类别(刘叔新)	146
同义词研究的几个问题(符淮青)	154

词语的对比聚合与反义聚合的比较(刘叔新)	163
新词新语规范基本原则(于根元 王铁琨 孙述学等)	176
研究实践	184
<b>第五章 语 法</b>	186
导 论	186
专 题	188
语法体系及其他(吕叔湘)	188
现代汉语语法要点(吕叔湘)	191
词类划分中的几个问题(文炼 胡附)	225
虚词研究浅论(陆俭明 马真)	231
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华萍)	246
语法分析和语法体系(朱德熙)	258
句子分析漫谈(胡附 文炼)	265
汉语语序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文炼 胡附)	274
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胡裕树 范晓)	280
汉语句法中的歧义现象(朱德熙)	292
汉语句法分析方法的嬗变(陆俭明)	307
关于语义指向分析(陆俭明)	318
句子的理解策略(文炼)	333
复句问题论说(邢福义)	339
复句分析(张斌)	356
研究实践	362

# 前 言

—

本卷导引的编辑原则是：突出教学重点，扩展教学内容，拓展学术视野，反映学术进展。因此，各个部分所占篇幅不是均等的，各部分所涉及的内容也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根据教学需要，有所侧重。

本卷导引共分五章，分别是“绪论”、“语音”、“文字”、“词汇”、“语法”，每章由三大部分组成：导论、专题（导言、选文、延伸阅读、问题与思考）、研究实践。

“导论”注重从理论背景上、学术发展上简要介绍所选文章的学术价值所在，但并不限于所收文章；对于“选文”部分所附“延伸阅读”开列的文献，我们也适当地做了一些介绍。同时，还少量引用、介绍了一些没有列入“延伸阅读”的文献的观点（都已注明出处，以供查阅）。

专题部分以所选论文的论题为中心，每篇选文前附“导言”，后附“延伸阅读”和“问题与思考”。“导言”着重介绍所选文章的内容概要，在力求客观、准确地介绍基本内容的同时，也适当作了一些评价。“延伸阅读”开列了一些专题文献的篇目。不论所选文章还是“延伸阅读”的文献，其中的观点都不尽相同。这当然有助于我们比较全面地、多角度地理解问题并分析问题。“问题与思考”则提出了一些聊供参考的话题，或者是提示文章中需要仔细理解的内容，或者提出有待进一步讨论探索的论题。由于学术识见所限，不一定准确，当然也不周全，只是提供一些线索而已。

“研究实践”是在选文部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动手”的论题范围；仅仅是示例，具体题目可以在此范围内选择，也可以在“问题与思考”所开列的题目中选择，当然也可以自己另选。“研究实践”是课程教学的一部分，自然应该力求出成果，但更应重视其过程，重视基本科研训练。

本卷所收论文主要选自学术期刊，少数选自专著或论文集。

限于篇幅，文章的选收自然难免有遗珠之憾，这只能期待将来有机会再作调整、适当增补。

二

本卷导引在文章的选收方面注重知识性和研究性的结合，具体安排各章并不相同，但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一些专题的讨论，比一般教材在同一问题上涉及的知识面更广，分析得更深入，观点和方法也更新。各章所收文章，或者重点地反映了二十多年来学术研究的一些进展，或者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二十多年来的基本学术进展。

因此,本卷所收文章作为教学研究的参考资料,是很有价值的。

本卷导引编辑的基本用途是作为教材,因此我们选收文章时,尽可能兼顾现代汉语各个部分的基本内容或重要内容。当然,从目前一般通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范围看,所收文章还不能完全覆盖所有的知识点,而其中有些基础知识又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在各章的“导论”中,我们对目前一般通行的该部分教学内容作了概略的介绍。这些内容,可以由教师在教学中有选择地适当补充,或指导学生自学。这方面的参考书可以由教师指定,但也不一定需要指定,可以由学生自行比较、选择。这种比较、选择,对于学生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学习过程。

本卷导引不仅全卷作为一个整体可以用作教材,其中的某一部分也可以独立出来作为教材。例如“语法”一章,内容比较丰富,所收文章基本上反映了二十多年来语法研究的主要发展,相对来说比较系统、比较全面,因此该章可以独立出来,作为语法专题选修课的教材。

由于所选文章具有一定的学术深度,因此我们建议,教师最好根据教学进度要求学生课前阅读。课堂教学形式可以多样化,但应坚持一点,就是尽可能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实现教与学的互动。

在教学进度方面,可以由教师根据教学课时总量考虑内容的增减,这方面我们的建议是,宁慢勿赶,力求让学生学懂、学透。作为一门课程,教学内容自然应当尽可能全面、系统,但我们同样重视教学中科学精神的培养和科学思维、科学方法的基本训练。学生无论将来从事什么工作,科学精神的培养和科学思维、科学方法的基本训练都是很有益的。

上述考虑和安排自然体现了我们对于现代汉语教学改革的一点儿想法,这就是尝试把本课程的教学由讲学科基础知识为主转向研究型教学模式为主。就中文系的现代汉语教学而言,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我们的想法和做法是否得当,还有待读者和同行专家给予批评指教。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卷收录专题文献时,本着尊重作者的原则,尽量保持文献原貌,但根据现行出版规范的要求,在不影响文献原貌的前提下,在注释方式等方面作了一些调整。

也有个别文献原文没有单列注释,只在文中连带着表述提及一些文献。对于此类情况,若改设脚注当会影响原文的基本面貌,甚至产生错乱,因此只能按原文样式录入。

在本卷导引编撰过程中,上海师范大学张斌教授、北京大学陆俭明教授、南开大学刘叔新教授、中国传媒大学于根元教授曾给予过指导,谨此表示衷心感谢。

# 第一章 绪 论

## 导 论

本章涉及的内容,包括现代汉语的定义和范围,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布和各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特点,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现代汉语规范化等重要问题。本章所收五篇文章讨论的专题是: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认识,汉语方言的形成、发展和分布,方言与普通话和书面语的关系,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过渡语,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

现代汉语是在近代汉语的基础上形成的。白话文运动是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彻底动摇了文言文的统治地位,使得一向只用于通俗文学的“白话”取得了文学语言的地位。白话文运动与国语运动相辅相成,推动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发展,成为现代汉语的形成标志。于根元的《五四白话文运动再认识》一文,主要从语文工作的角度总结白话文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意在为当今的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和语文工作提供借鉴。“延伸阅读”文献中,鲍明炜的《略论汉族共通语的形成和发展》指出我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总不出西安、北京、南京这个三角地区,汉语的主流就是在这个地区发展起来的,在这个地区存在着一个大体上共同的普通话。因此,汉族共通语的构成要素就是汉语传统的文学语言加上北京音。该文对汉民族共通语形成、发展的分析自成一说。至于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发展史、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中国语文工作发展史等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阅读“延伸阅读”文献获得或详或略的了解。

从狭义上讲,现代汉语专指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从广义上讲,现代汉语则指现代汉民族人所使用的母语,它不仅包括普通话,而且包括各地方言。狭义的现代汉语及其研究在语音、词汇、语法等部分有详细的讨论,但为了更好地理解狭义的现代汉语及其研究,必须对汉语方言及方言研究有一些初步的、基本的了解。通过许宝华、詹伯慧的《汉语方言》,我们可以概略地了解汉语方言的历史和现状。

民族共同语是在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游汝杰的《方言与普通话和书面语》简明扼要地讨论了方言与普通话和书面语的关系。作为现代汉民族标准语的普通话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但普通话与其他方言也有相互影响的关系。事实上,在方言和普通话之间普

遍存在着一种语言状态,即兼有普通话和方言两种成分的过渡语或中介语。研究、认识过渡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的特点,一是可以从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相互影响的角度了解、解释语言变异和语言发展,二是可以减少普通话教学中的盲目性,在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中,促进过渡语向标准普通话发展。李如龙的《论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过渡语》可以使我們获得对于过渡语的基本了解,启发我们关注过渡语,研究过渡语。

任何一种民族共同语的内部,存在一些分歧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分歧太大,语音、词汇、语法以及文字等方面的标准都很不确定,显然不利于语言交际作用的充分发挥,也不利于语言的发展。因此,必须开展语言规范化的工作,在语言文字应用中发展、完善规范标准,促进语言的健康发展,促进语言交际功能的充分发挥。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汉语规范化工作取得了公认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何更好地开展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是摆在语言文字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要取得实效,必须遵循语言文字本身的规律,更新观念,使规范化工作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戴昭铭的《规范化——对语言变化的评价和抉择》对规范化问题提出了很有参考价值的见解。我们在“延伸阅读”列出的参考文献,也很值得一读;当然,其中也有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 专 题

### 五四白话文运动再认识

于根元

#### 导言——

此文原载《语文现代化论丛》第二辑(语文出版社,1996)。

此文以社会语言生活实际的发展作为检验标准,从语言发展的本身规律、社会发展的需要、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紧密结合、有学科阵地、有创作实绩、有语言研究的成绩、有一批有影响的学者的倡导和支持等七个方面,阐释了白话文运动成功的主要条件和经验。作者总结历史经验,意在作为当今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和语文工作的借鉴。因此,文章对白话文运动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如理论简单化、政治化,学术性不强,倡导者自己实践的不彻底及脱离大众的倾向,以及学校教育中的问题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

新文化运动的先导和标志是白话文运动,这个运动的勃兴大致上在五四时期。一般把1919年前后的约十多年称为五四时期。

从文言文到白话文，是汉语书面语系统的变化，这个变化涉及语言观、文化观、社会观、政治观等方面的巨大变化，或者说是反映了上述观念中持有先进思想的力量觉醒、勃起。很多人要在这个运动中经受检验。这个运动引发了普通话的推广、大众语的讨论、语文教学改革，它起初指导思想的积极和消极的因素影响了后来的近百年。

汉语比较统一的书面语在奴隶社会就形成了，是以北方话为基础的，这就是文言。文言曾经长期用作古代汉语统一的书面语，留下了丰富的文献。但是文言一开始就同口语有距离。文言后来同口语的距离越来越远，学习起来非常困难，能使用的只是少数人，因此，另外一种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书面语白话就起来同文言抗争。

早期白话，开始于南北朝的“变文”。为了“劝善”和“娱心”，各地佛寺里大规模地讲唱佛经故事和非佛经故事，原来用文言念颂经文变为讲唱，讲的部分里用了许多接近口语的早期白话。这种讲唱到唐代就很盛行了。清朝光绪年间千佛洞的藏经开始被发现，大都是宋朝时藏的，其中几乎都是佛经故事，也有俗文学故事，是唐末五代人抄写的，如《唐太宗入冥记》《孝子董永传》《秋胡小说》等。

到了宋代，新的讲唱文学如鼓子词、诸宫调等又出现了，而且深入到了农村。用早期白话著作，叙述故事，叫作“平话”，就是今天说的“白话小说”，也开始有了。这种早期白话，逐渐取得书面语的地位。元朝皇帝的圣旨也用白话。元、明、清用早期白话写的长篇小说如《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影响很大。

五四时期，白话同文言较量，要取得书面语的正统地位。关于白话文运动和整个新文化运动，高天如的《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有比较详细、深入的研究，我从高著引述颇多。

提倡白话，起初大体上是一种文学主张。提倡“诗界革命”的黄遵宪于1868年在《杂感》一诗里写道：

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

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黄遵宪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我手写我口”后来成了许多人的主张和口号，甚至成了写作的方法，不时有人批评，但不时又有人提倡。近来有人提出深入的讨论，提倡者日减。这是当时有进步意义的简明好记能够流传但又简单化有严重缺陷的口号。黄遵宪那时候就主张或者有意收集、整理时行的流俗语，确实很有胆识。

梁启超肯定“俗语文学”，认为“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凡百文章，莫不有然”（转引自高著9页），认识到“俗语文学”是宣传平民的社会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裘廷梁在《苏报》上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提出“崇白话废文

言”。他说：

文言也，白话也，繁简不同，而为用同。只有迟速，更无精粗必欲重此而轻彼，吾又乌知其何说也？且夫文言之美，非真美也。汉以前书曰群经，曰诸子，曰传记，其为言也，必先有所以为言者存。今虽以白话代之，质干具存，不损其美。（转引自高著 9 页）

他还提出：“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没有过多地贬低文言，或许是当时的气氛比较平和，或许是维新派的一种主张和态度。不过他认为白话“简”和“省力”“便贫民”的主张，透露出不少人早就有了语文只是个实用的工具、简便则好的简单化认识。

因为崇尚实用，白话报刊、白话文学有了发展，白话教科书和学术著作也有刊行。但是关于规范的白话的理论建设还很不够，特别是缺乏从内容到形式都美的文学时作，白话文运动的勃兴是五四时期的事。

也许是造声势的需要、某些主张者认识的偏颇，加上保守者反对得激烈，火药味也渐渐浓起来。

倡导白话文有了个重要的阵地，就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1916 年 10 月，《新青年》第 2 卷 2 号上发表了胡适致陈独秀的一封信，提出作为文学革命的写作的八事，后来第 5 号上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把“八事”调整为：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而且提出：“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陈独秀基本上支持胡适的主张，并且在《新青年》第 2 卷 6 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首创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尤其是“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从改革文学形式上提倡白话文学。

响应文学革命、主张白话文正统地位的有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新青年》第 2 卷 5 号发表的钱玄同 1917 年 2 月 25 日致陈独秀的信说：“胡君主张采用白话，不特以今人操今语，于理为顺，即为驱除用典计，亦以白话为宜。”“弟对于应用之文，以为非做到言文一致地步不可。”刘半农在《新青年》第 3 卷 3 号上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说：“今既认定白话为文学之正宗与文章之进化，则将来之期望，非做到‘言文合一’，或‘废文言而用白话’之地位不止。”他们企求的是汉语书面语的全面变革。

新文化思潮迅猛发展，特别是五四运动的爆发，白话文运动也迅猛发展。1918 年 5 月《新青年》第 4 卷 5 号开始完全改用白话文，同期刊登了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

说《狂人日记》。1918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1919年1月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新潮》月刊，那时候还有北京的《国民公报》、上海的《时事新报》等，都是宣传、实践白话文的重要阵地。五四后大批白话文的报刊相继出现，鲁迅、郭沫若、田汉、叶圣陶、冰心、朱自清、瞿秋白、茅盾、巴金、柔石、老舍等一大批新文学的奠基人以白话文学创作的实绩确定了推行白话文的牢固基础。五四以后，白话文的汉语书面语的正统地位得到确立。白话文运动在这一点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从汉语的发展来说，开始了现代汉语的阶段。

## 二

我国社会语言生活实际的重大发展，是检验白话文运动成功的标准，也是检验这个时期这方面语言应用研究成功的标准。

白话文运动成功的主要条件和经验有这么一些：

一、客观上符合语言发展本身的规律。言、文也就是口语、书面语，始终沿着“比较协调一致——打破协调一致——新的比较协调一致”的路线发展的，完全协调一致是不存在的，否则口语、书面语就不能发展了，所以“我手写我口”是有严重缺陷的主张和口号。这个路线也体现了语言本身的调节功能。书面语对口语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不能同口语过于脱节。在人们的语言交际中口语是主要的，比书面语更经常、更活跃。书面语和口语相比较，总体来说，处在发展前沿、起主导作用的是经过一定加工的口语。汉语的文言是有过巨大贡献的，文言作品包括文学作品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是主流、正宗，但是从文言到白话，是汉语书面语发展的必然趋势。五四时期白话要占据汉语书面语的正统地位，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候。社会语言生活实际、语言发展规律的力量是巨大的，在它面前是顺者昌、逆者衰。白话文运动是“顺乎自然，因势利导，做促进工作”。

二、适应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正得其时。上个世纪之交的时候，中国正处在落后、衰败的状态。改良派里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推行白话文，有利于童蒙和民众学习语文，接受起码的教育，好使国家富强。革新派主张解放思想、宣传民众、唤起民众，使白话取得书面语的正统地位。白话文运动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白话文运动在时间上抓住了机遇。语文改革一般情况下是小步微调，不能急；赶上某些时机，步子一定要大一些。从这一点来说，白话文运动不仅客观上符合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还客观上符合语言发展的外部规律。这是白话文运动成功的最基本的条件和经验。

三、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紧密结合。五四之前，白话文运动有了不少舆论准备，也有了不少成绩。后来它作为一项运动，不是单纯的书面语的改革运动，而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部分，作为文学革命的一个突破口。白话文运动的意义，很快为有识之士和民众所认识，顺民心，得人心。五四运动狂飙式的发展，使白话文运动突飞猛进。白话文运动不是利用五四运动抬高身价，五四运动也不是利用白话文运动来先

做文章，它们本来是紧密结合的。语文工作本来就不是单打一的，它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又推动社会的发展。我们常常可能有两种偏向，一个是明明有多方面的重要的社会意义，我们只是作为一般宣传说说而已，没有让广大民众认识并且一起来做，又责怪民众不理解、不支持。还有一种是把它作为一般的社会活动，本身的研究、宣传、组织简单化。冷静下来总结的时候，有可能又责怪它跟社会活动结合得过于紧密。如果克服这两种可能的偏向，既不单打一，又有本身的个性，在社会的发展中既作出贡献，本身的队伍、学术理论等也有长足的发展。如果后者没有多少发展，那大体上是乘社会活动搭车发展，本身会留下很多后遗症，实际上也没有对社会发展作出有个性的应有的贡献。五四白话文运动在这方面有经验，也有教训。

四、有强有力的主编陈独秀主持的有影响的《新青年》杂志作为宣传、讨论、研究、发表实绩的主要阵地。一个强有力的刊物，作为一个新学科来说，有时候是新学科建立的标志；作为一个研究所来说，常常顶得上半个所；作为某种倡导来说，常常是一面旗帜。

五、有创作的实绩。这是证明白话文运动正确的实践。倡导、争论，最后的胜负都要落实到实绩这一点上，文学创作是非常重要的实绩。所以，负责任的有远见的语言学队伍都要用很重要的力量来跟作家交朋友，研究作家作品语言。有成就的作家一定对语言的发展有清醒的认识，用代表发展趋向的语言表示代表发展趋向的思想。五四时期，一批作家在很短的时间里拿出可以跟有几千年历史和经验的文言比较的实绩来，是因为这些作家学习了古典文学，学习了早期白话文学，学习了外国文学，尤其重要的是具有革命的精神。

六、语言研究的成绩。上面说的都是广义的语言应用研究的范围，意思是说语文工作、语言计划本来是一项系统的工程，语言学者要同各有关方面紧密协作。关于语言学本身的研究，五四白话文运动处在运动时期，很难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但是紧紧抓住了关键的几点：语文的主要功能是让人明白；言文一致，言文便于发展；今人要操今语；外国发达国家言文一致；言文一致便于民众；白话文是一种进步。关于白话文的涵义以及同方言、文言、外语等的关系，也有一定的研究。例如钱玄同认为：“非用方言不能传神，不但方言，就是外来语也可采用。”（《尝试集序》，《新青年》第4卷2号）孙国璋提出：外来语“写在哪一种文字中，就从哪一种文字写去”。（关于“论 Esperanto”的通信，《新青年》第4卷4号）傅斯年提出：“以白话为本，而取文词所特有者，补苴罅漏，以成统一之器。”（《文言合一草议》，《新青年》第4卷2号）林玉堂提出“白话为吾人平日所说的话，所以其性质，最易泛滥，……我们需要告诫用白话的人，不要胡思乱写，没有去取”（《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新青年》第4卷4号），对“我手写我口”的疏漏已经提出了批评。1925年，唐钺发表《文言文的优胜》《告恐怖白话文的人们》，比较深入地分析了反对白话文的论点的错误，动态地认为白话文也是发展的，那时候的白话文“……不特非‘古文’所能梦见，并且也非从前的白话文所能梦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转引自高著60页）

五四时期,这些文章仍然不用纯语言学论文的面孔出现,跟中国的传统和风格有关。跨学科的人谈跨学科的问题,把语言学问题跟很多问题放在一起谈,谈起来方便,也便于更多的读者接受。文章都有针对性,甚至是论争的,讲时效,比较短,学问也在里面了。这也是动态的研究。好的语言学论文,哪怕是很实的专题研究的,也有针对性,也体现一种理论上的见解。针对当前的深刻的问题,深入实际又从理论的高度解决得比较好的,才有长远的价值。

七、一批倡导者、支持者是有影响的学者,有深厚的国学的底子。他们当中在一个历史时期是先进的,运动深入,加上本人起初就表现出来的缺陷,有的后来落伍了,转向了,但是仍然有一批人在探索中继续前进。他们有的是共产主义的领导人,有的是作家、诗人,但是几乎都是影响的学者,容易影响一大批青年。他们有深厚的国学的底子,知道文言的利弊,论争起来容易切中要害。他们对外国也有比较深刻的了解,视野开阔。

### 三

白话文运动也留下了不少问题,主要是理论上简单化。拿胡适的“八事”来说,“须言之有物、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是用了白话文就能解决的,这些就我们今天的白话文来说,都还是个事儿。“不避俗字俗语”一事,从浅层次来说,缺乏分析;从深层次来说,如何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近百年来都是个没有很好解决、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不摹仿古人、不用典、不讲对仗”都过于简单化。拿陈独秀的“三大主义”来说,也缺乏分析。胡适后来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把“八事”改为“四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新青年》第4卷4号)1918年1月,胡适在致钱玄同的“论小说及白话韵文”的信中把白话的语言特点归纳为三条: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语。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入几个文言字眼。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新青年》第4卷4号)高天如对此有很深刻的分析:

胡适关于白话的“白”的释义和“说话”的要点,无疑是突出地强调了“言文一致”的基本原则的。但三条释义和四条要点的并列,又都是混淆了语言本体和语言运用的区别。“说白”“土白”是就语言本体而言,而“明白如话”“没有堆砌涂饰”之类则是关于语言运用的要求。在“说话”的四条规则中,也只有“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这一条是属于语言本体的要求,其余也是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提示的。关于语言本体的要求,有两点是应该注意的:一是他所谓的“白话”或“话”,是从口语的角度提出的,并没有明确区